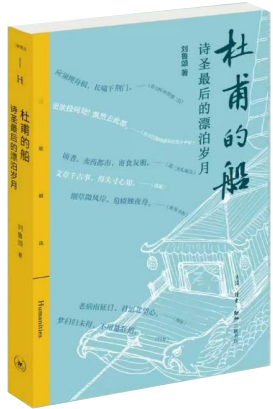


# 杜甫在湖南：驾一艘大船，赴孤勇“南征”

刘鲁颂



《杜甫的船：诗圣最后的漂泊岁月》  
刘鲁颂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6年3月出版

## 1. 一艘制作精良的私家“云帆”

广德元年(763)春天，正在梓州(今四川三台)游历的杜甫听到安史之乱结束的消息，欣喜若狂，写下了那首著名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产生了置船回乡的念头。

最初，他打算在梓州租船，当年秋天沿梓潼江航行至长江，然后顺江东下。此后不久，他参加了当地的一次聚会，结识了阆州(今四川阆中)王刺史。当时，阆州是西南地区新兴的造船基地，出产物美价廉的好船。于是，杜甫立即去了阆州预订了一艘船。随后半年，他多次往返阆州、梓州之间，一边筹款，一边监造。据估算，当时置办一艘像样的船约需1000缗钱，相当于一名县令四年的薪酬。第二年年初，船竣工下水了，杜甫率领全家山行200余里来到阆州，准备登船出蜀返乡。

杜甫的这些活动，在其诗作中有明显的痕迹。唐代是一个“江湖上的国度”，水运交通繁荣，基础设施完备，江河沿途的“横塘”可以泊船，“水驿”可以休憩。唐代造船业发达，船只普遍采用水密隔舱、钉接榫合、油灰捻缝和油漆涂底等工艺，具有较强的结构强度和防渗漏防腐能力，航程远、吨位大、航速快。而巴蜀地区盛产木材、铁、麻、石灰等，造船材料丰富，发展造船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巴蜀地区各大造船基地中，阆州离梓州最近，造价最低。

杜甫所造的是一艘大船。永泰元年(765)，杜甫写过一组题为《三韵三篇》的诗，显示他对造船工序十分熟悉，很可能与他一年前在阆州监造船只的经历有关。诗中描述的“起橹”“挂席”“下水”这些大场面，只能在建造大型船只的工场才能看到。杜甫试船时，特意强调他最大的感受是“坐稳”，而平稳正是大船的特征。后来，他在船上生活，多次在诗中用“危樯”“高帆”“云帆”形容桅杆的高大，用“洞房”形容船舱的宽敞。

大历四年(769)四月，杜甫从衡阳返回长沙，船上搭载了多位“同舟”。当时船上有十余名家眷、两三个奴仆、三个船工，加上“同舟”，说明杜甫的船乘坐二十人以上也能在激流中航行无忧。

十月，湖南幕府一位叫苏涣的侍御上船造访杜甫，吟诵了自己创作的诗歌，杜甫被深深打动了，那吟诵声铿锵在耳，第二天仍然觉得“书窗几杖之外，殷殷留金石声”。杜甫的竹杖是邛州名产，至少有两米长，他能自如地携杖入舱，说明船舱的宽度有数倍竹杖的长度。

十一月的一天夜里，长沙大雪纷纷，但因船大舱深，杜甫竟没有察觉到，直到将蜡烛伸到舱外探照，才能肯定下雪了。

大历五年(770)四月，长沙兵变，杜甫逃往衡阳途中，一天夜里有盗贼袭击了夜泊码头的客船，他在船舱没有听到动静，也侧面证明他的船大，且隔音效果还不差。根据现有出土唐船残体的尺寸推测，杜甫的船长达20米以上，宽达6米以上。

杜甫的船具备“家”的功能，底舱储藏的粮食、药裹和酒瓮，足够用度数月。通过杜甫的诗歌，我们能够探知，这是一艘带有巴蜀风格的双体“并舟”，船身绘有彩饰，船首画着夸张的鸱鸟；船体中部后部竖立高大的桅杆和阔大的风帆，桅顶挂着羽毛制作的候风器“五两”，船头用于拉纤的“百丈”盘缠；船舱带帘，舱檐悬挂风灯。船舱的门窗上都挂有垂帘，窗内安放花当盆栽；舱内用屏风和帷幔分隔，外侧摆放几案、凭几，案上有烛台、书卷、笔墨纸砚，旁边有剑、琴；船舱内侧则是供家人憩息的杜席。船舱两壁摆满书架，书架上系满了书卷，杜甫藏书丰富，他的船实际上是一艘“书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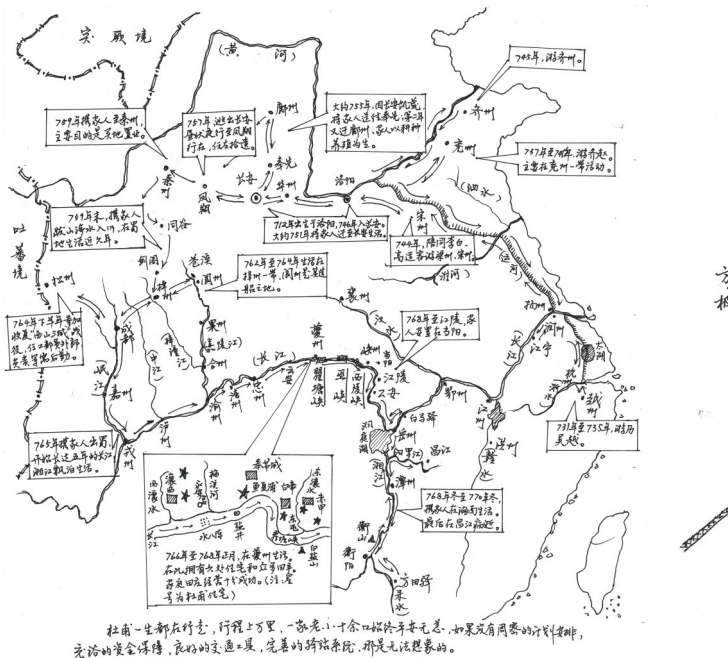
这是一艘质量极好的船，在岷江、长江和湘江五年多的航程中，只有在夔州有过一次故障维修的记录。



2025年5月，作者在湘江漂流十一天，实地考察杜甫行迹。作者供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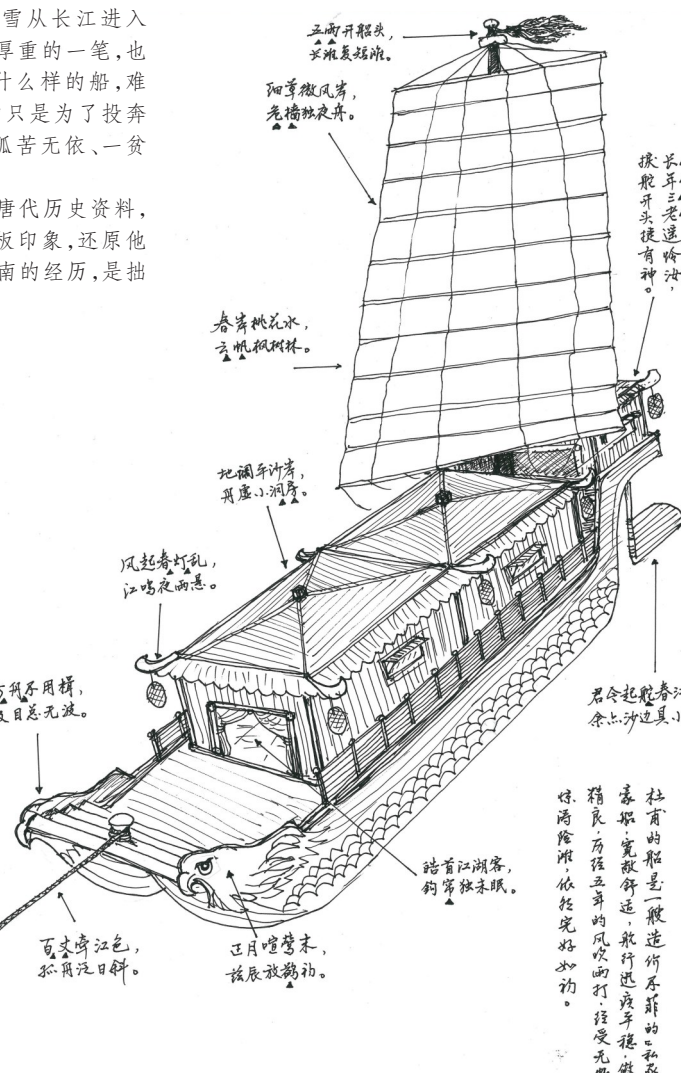
大历三年(768)岁末，杜甫带着一家十口，乘船迎着漫天风雪从长江进入洞庭湖，开始了长达两年的湖南漂泊生活，在湖南文化历史上写下厚重的一笔，也给人留下诸多谜题。例如，杜甫晚年寄寓的这艘船，到底是一艘什么样的船，难道真是一艘破烂不堪、不蔽风雨的“扁舟”吗？他为什么来湖南，真的只是为了投奔故人、解决生计吗？他在湖南的生活到底怎样，真如人们想象那样孤苦无依、一贫如洗吗？

七八年来，笔者系统爬梳杜甫现存的1400多篇(篇)诗文，参证唐代历史资料，寻找蛛丝马迹，链接草蛇灰线，力图打破千余年来人们对杜甫的刻板印象，还原他的真实人生，写就一部《杜甫的船：诗圣最后的漂泊岁月》。杜甫在湖南的经历，是拙著的重要内容。



▲杜甫行迹图。

作者手绘



▲杜甫在湘江上航行的大船想象图。

作者手绘

## 2. 一次舍我其谁的孤勇“南征”

杜甫到湖南后，在岳阳逗留了一月有余，写下名篇《登岳阳楼》。其间，李白的朋友裴隐把他接到家中生活了一段时间。裴隐家居临湘白马矶，在昌江(今湖南平江)也拥有一座草堂。

大历四年(769)二月初，杜甫从白马潭出发，经长江在城陵矶再次进入洞庭湖。这次，他没有在岳阳城停留，而是按照晓行、午次、夜宿的节奏，经青草湖、白沙驿、乔口、铜官渚，于二月二十四日到达长沙。在长沙休整一周左右，继续逆水南行，经韶石浦、空灵岸、花石戍、挽洲、双枫浦、津口，大约于三月初七抵衡山县。这时，因病情发作，他不得不停下来接受治疗，经过用药和针灸，身体慢慢恢复，两旬后已能拄杖行走。

养病期间，杜甫很可能给衡州刺史兼湖南观察使韦之晋去了信。韦之晋是杜甫年轻时结识的忘年交，杜甫来湖南，就是受到他的邀请。杜甫不知道的是，这年二月二十二日，朝廷任命韦之晋为潭州刺史兼湖南观察使，责令他率“湖南军”移驻长沙。按照唐代驿递速度推算，诏令应于三月初二送达衡州。这时，杜甫已经离开长沙。当杜甫滞留衡山时，韦之晋正忙于驻军移防准备，便安排判官郭昉前去迎接杜甫。

杜甫大约在三月底到达衡州。韦之晋率部移驻长沙之后，杜甫因健康原因留下休养，待他返回长沙时，应是四月中下旬的光景。在长沙，他住进城南湘江边的“江阁”调养身体，其间参与湖南幕府的活动，与亲朋相聚，还游览了河西的岳麓山，心情舒畅，身体有所康复。可惜的是，两个月后韦之晋意外病逝，杜甫的生活境遇便大不如从前了。到了秋天，他便从“江阁”搬回船上，但仍然与湖南幕府联系密切，甚至参与了一些工作。为了贴补家用，他还时常到城内“鱼市”卖草药。

此时，他已经有了北归的打算，但考虑到湖南冬暖，利于疗养身体，便留下来过冬。没想到，第二年四月，潭州兵变使贼玢兵变，杜甫连夜从城内逃到船上，直奔衡州。大约四月底或五月初，他抵达衡州，紧接着又逆水而上，前往郴州。当时正值仲夏，洪水汹涌，杜甫行至方田驿，被洪水困了七八天，幸而耒阳县令相助，送来酒食，又将他接到县城。六月，杜甫回棹北上，在长沙居住了半年左右，于当年十二月启程返乡。但行至洞庭湖时，病情再次发作，他意识到自己不久于人世，以沉痛的心情伏枕写下了绝笔诗。

据相关资料推测，杜甫因病中断北归，转而沿汨罗江而上，寄寓在裴隐位于昌江的草堂，最后在那里病逝和下葬。四十三年后，即元和八年(813)，他的孙子杜嗣业将其灵柩送回河南偃师，归葬于首阳山下家族墓地。

## 3. 一场功在后世的失败“易制”

然而命运弄人，正当“易制”起步之时，韦之晋却突然病亡了。尽管如此，杜甫仍然鼓励李暉和裴虬等人坚持下去。可悲的是，继任湖南观察使崔瓘志大才疏，“减兵甲”用力过猛，激起兵变，长沙城“烈火发中夜，高烟焦上苍”，“竟流帐下血，大降湖南帅”，兵变很快得到平定，但湖南已是满目疮痍，杜甫很快得到平定，但湖南已是满目疮痍，杜甫很快得到平定，但湖南已是满目疮痍。

经过十余年的社会动荡和颠沛流离，他对社会现实有着深刻的洞察，来到湖南之际，他的思考已经十分成熟。当时，藩镇割据和“逃户”两大社会问题愈演愈烈，杜甫有针对性地提出“上请减兵甲，下请安井田”两大主张，并借助韦之晋的力量在湖南七州推行。这一段时间，杜甫身着官服、腰佩银章，参与湖南幕府的工作，结交了一批同志，如观察使韦之晋、道州刺史裴虬、判官李暉、侍御苏涣、参军张建封等等。大历四年(769)四月至六月，“易制”部署告一段落，杜甫抱病登上岳麓山，发出“桃源人家易制度，橘洲田土仍膏腴”的感叹，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杜甫在湖南的努力，是一场失败的改革。由于韦之晋在唐史中没有立传，更由于这场“易制”草创未成，它被彻底湮没在历史长河里，不为人知。但从杜甫的湘江诗里，仍然能捕捉到一些信息，让我们能够了解到在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大变局中，有许多像杜甫这样的人，曾试图去托举它，竭力要挽救危急转直下的历史颓势。

杜甫的努力尽管失败了，但他的两大主张在后来的历史中能听到回响。他去世十年后，朝廷实施“两税法”，推倒了“租庸调”这座赋税大山。而“上减兵甲”的大声呼吁，要在近二百年以后的北宋才得以实现。

## 湘江观潮

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协办

在数智时代、文化均权的新大众文艺背景下，农民诗人以其独特的生命体验与文化身份，成为观察当代中国文艺生态的重要窗口。

从“沂蒙二姐”吕玉霞、“烧烤诗人”王雄彬、唐豆腐的肖大妹、“养鸡诗人”邓春生、登上联合国讲坛的农妇诗人韩仕梅、脑瘫农妇余秀华等农民诗人个体化书写到宁夏西海固作家群、湖北秭归“三闾骚坛”诗社、湖南苏溪村“耕读诗社”、四川隆昌诗社等农民诗歌创作的集群涌现，农民诗人用沾满泥土的诗句记录着乡土中国的深刻变迁，成为醒目的文学现象。这不仅是农民诗人个人创作的丰收，更是新大众文艺崛起的重要体现。

在传统文艺作品中，农民往往是“被书写”的对象，农民形象由他者建构。而在新大众文艺时代，农民诗人体现出从“被书写”到“自我书写”的主体性的回归。农民诗人不仅表达农民主体的生活与情感，如邹石太“叶弯仑上将军石，镇守苏溪一茶冲。若山口上狮子守，上保君臣下保民”对乡村生活景观的展现，王笃臣“深秋凉雨打桂花，羊儿欲吃响鞭打”对种地、养猪、放羊等日常生活体验的书写，邹胜阶“牲畜养殖圈圆满，田土精耕岁岁增”对乡土变迁的记录，更有余秀华《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对自我欲望、尊严与生命力的宣告。

农民身份的自觉确认，构成了他们诗歌创作的底层情感结构。这种身份确认，不是传统对农民身份悲情的自我贬义，而是骄傲的认领。在创作主体层面全面彰显新大众文艺反映新时代大众生活、情感体验和生命体验的人民文艺思想。

诗歌是文艺的源头之一，传统的诗歌往往以意象的凝练与跳跃、诗歌形式对韵律与节奏的注重、语意的含混与多义等被视为语言艺术的最高形式。

而农民诗人的创作往往直接取自劳动、生活场景，表达对生活直观感受。如网名为“望星牧羊仔”的农民诗人以“放羊的艰辛是不寻常的苦/只有远处的风景/和近处的戈壁滩”等诗句记录草原生活的严酷。吴建兵《母亲散步》写轮椅上的母亲在乡间巡游的诗句“油菜花金黄，新房子霸气……王家停停，车站歇歇，曾经老伴在炎炎烈日下，排灌时跌跌的样子，此刻格外清晰”，都以其朴实的语言表现村民生活的质感。韩仕梅“是谁心里空荡荡，是谁心里好凄凉。是谁脸颊泪两行，是谁总把事来扛，是谁伤透了你的心房。是谁gu灯自欣赏。是谁是我，我是谁，时光congcong如流水，掠走姑娘的青春梦”，更以夹杂别字和以拼音替代的诗句书写内心的孤寂。

他们的诗作意象似乎直接从劳作现场生长出来，抒情直白。这种“自下而上”的生长使农民诗人的创作带有未经训练的野性与质感。它以“泥土气息”的审美品味，纠正了“土气的”就是“落后”的审美偏见，成为当代中国文艺最坚韧、最具生命力的部分。

传统的诗歌创作囿于纸张和案头，媒介工具的革命性普及让表达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农民诗人通过智能手机随时随地记录灵感，并通过新媒体迅速传播。

诗与影像结合分享使诗歌感染力放大，引起公众的共鸣而出圈。新媒体平台的兴起改变了传统文艺的准入机制，点赞、转发代替了传统的审稿制度，农民诗人作品可以绕过传统文学期刊的审稿壁垒直抵读者。

山东农民“老四”的诗歌通过短视频获得百万点赞，山东的“沂蒙二姐”吕玉霞通过抖音账号，获赞1910万次，粉丝170多万，甚至登上央视春晚。初中肄业的韩仕梅通过快手短视频账号发表诗作获得众人的广泛关注，被称为“田埂上的写诗者”，后来更是登上了联合国的演讲台。诗歌创作与发表门槛的降低与传播效应的提高从底层逻辑上重塑了文艺创作与传播的生态。

农民诗人的创作虽然代表着主体性的回归，但他们因缺乏专业训练被文学界精英阶层轻视，而在乡村，写诗又被村民视为“不务正业”。他们游走于“文学场”与“生活场”，同时又受双重场域边缘化而造成身份的尴尬。

他们的创作虽然以原生态的语言与大众化的品位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但是原生态的新鲜感过后，审美品味粗糙的局限便日益凸显，成为制约农民诗人后续发展的瓶颈，许多农民诗人在短暂走红后迅速沉寂，难以实现可持续的创作发展。

此外，数字平台的赋权使农民诗人得以迅速出圈。但是消费主义的流量导向使农民诗人的创作被资本收编，成为人们猎奇的文化符号，真实的个体经验反而被新的刻板印象所遮蔽，农民诗人的创作严重存在被消费主义文化异化的风险而失去其原本的内生动力。

## 土地里长出的「诗心」

农民诗人创作现象审视

傅建安 孙良彪